

幼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之調查研究

許孟勤^{*}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家長在家庭中使用本土語言的現況，以及家長在本土語言信念、本土語言管理與本土語言實踐三者之間的關係。研究者自編「幼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問卷」，以桃園市幼兒園家長為調查研究對象，共取得700份有效樣本。研究資料透過變異數分析、集群分析及偏最小平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歸納如下：一、整體而言，幼兒家長對本土語言的看法普遍為正向肯定，然實際在家庭中使用本土語言以及維持本土語言環境的行動卻不足。二、不同本土語言能力及家庭型態的家長，在本土語言信念、管理與實踐面向具有顯著差異。三、依據本土語言、管理與實踐的現況，本研究將幼兒家長分為「弱本土語言政策型」、「中本土語言政策型」及「強本土語言政策型」三類集群，結果顯示，年輕世代的家長較傾向屬於「弱本土語言政策型」。四、路徑分析顯示，幼兒家長本土語言信念對本土語言管理及實踐有直接影響力，本土語言管理對本土語言實踐亦具正向影響，家長的信念和管理策略對於提升家庭本土語言的使用有關鍵作用。

關鍵詞：幼兒家長、本土語言、家庭語言政策、語言使用、語言管理

* 許孟勤：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壹、研究動機

語言是人類重要的資產，多語的社會反映多元文化的特質，故語言有其保存的價值。惟臺灣本土語言在過去推行國語政策的影響下，雖然祖父母及父母世代仍能使用其族群的语言，但在與幼兒對話時，卻逐漸轉用華語，形成語言轉移現象，導致世代間語言傳承的斷層（黃建銘，2011）。近年來，政府開始推動本土語言教育政策，致力搶救急劇流失的本土語言。然而，本土語言的保存並非僅依賴校園的本土語教育即可，尚須有家庭和社區的共同支持。因此，語言復甦的關鍵應從家庭著手（Huss, 1999）。

目前，許多國家的語言政策已將家庭與社區的語言規劃（language planning）納入政策推動重點（Spolsky, 2004）。家庭語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y, FLP）指的是家庭成員間語言使用的規劃，反映家長對幼兒所接觸語言的隱性或顯性選擇（Spolsky, 2009）。此政策的理論基礎為以色列語言學者Spolsky（2004）的語言政策觀點，涵蓋語言信念、語言管理及語言實踐三個相互關聯的要素（Spolsky, 2009）。

國內針對家庭語言政策的研究，多以少數家庭個案進行探討，主要聚焦於本土語言的使用規劃，或是家庭語言信念和語言管理兩要素之間的關係，尚缺乏以量化研究方式來驗證Spolsky家庭語言政策模式的相關研究（張學謙與賴佳珍，2014；陳淑娟，2007）。有關學前教育階段家長的本土語言政策，以及不同背景家長在家庭語言政策上的差異，仍待進一步研究。學前教育階段對幼兒語言發展有深遠影響，但隨著幼兒年齡的增長，這種影響會逐漸減弱（Arnaus Gil, 2002）。因此，本土語言能否在幼兒家庭中扎根並得以傳承，將成為本土語言存續的關鍵議題。

本研究聚焦於下列問題：臺灣幼兒家長目前和幼兒在家使用本土語言的情況為何？不同背景變項家長的本土語言政策是否存有差異？幼兒家長在本土語言政策上存在哪些類型？各類型家長的人口背景特徵為何？以及本土語言信念、管理與實踐三個面向存在何種關係？

基於上述問題意識，本研究透過實證調查與分析，檢視幼兒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的現況，分析其類型，並檢驗家長本土語言信念、本土語言管理及本土語言實踐三者之間的關係。本研究結果可為未來推動家庭本土語言政策及本土語言教育提供改善建議。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 一、瞭解幼兒家長本土語言信念、本土語言管理及本土語言實踐的現況。
- 二、比較不同背景變項家長在本土語言信念、本土語言管理及本土語言實踐上的差異。
- 三、分析幼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的類型，並探討各類型人口背景特徵的差異。
- 四、探討幼兒家長本土語言信念、本土語言管理及本土語言實踐三個面向的關係。

貳、文獻探討

以下將根據研究目的，從「家庭語言政策」、「語言信念、語言管理及語言實踐之關係」及「臺灣家庭本土語言政策之相關研究」三個面向進行文獻探討。

一、家庭語言政策

家庭語言政策在2000年代初期引起國際關注，強調家庭對語言保存具有關鍵性影響（Luykx, 2003）。家庭語言政策指的是家庭成員在語言使用上明確且公開的規劃（Schiffman, 1996; Shohamy, 2006），其意涵結合了語言規劃政策（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Hult & Johnson, 2015）和兒童語言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King et al., 2008）。King與Fogle（2013）擴展了家庭語言政策的定義，指出家庭的語言使用計畫不一定是公開或明確的，有時也可能受到隱蔽的信念所指導。以色列語言學者Spolsky（2004）的語言政策觀點常被視為家庭語言政策的理論基礎（Rose et al., 2023），Spolsky的語言政策由三個獨立但相互關聯的要素所組成：語言信念（language beliefs）、語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及語言實踐（language practices）。

語言信念是推動家庭語言政策的主要力量，它是家庭成員對語言、語言使用、雙語使用及語言地位的信念、觀點和假設，具有隱性特徵（Curdt-Christiansen, 2016）。家庭想要保存母語，大致有三種主要考量：語言作為聯繫、語言作為文化，以及語言作為資本。其中，語言作為聯繫的信念認為母語對於維護與母語族群的關係至關重要（Cho, 2000; Zhang & Slaughter-Defoe, 2009）；語言作為文化的信念強調母語對於表達、維護和促進族群文化的重要性（Schechter et al., 1996）；語言作為資本的信念則關注母語可能對課業、升學或就業帶來的潛在利益（Lin & Warschauer, 2011）。

語言管理是指透過各種干預來改變或影響家庭成員的語言使用與學習，具有顯性和隱性的雙重特性。例如：父母可能會訂定在家中使用某種語言的規則，或指導孩子選擇特定語言（Rose et al., 2023）。Lanza (2007) 舉例說明家庭語言管理的多元策略，例如：父母各自使用不同語言，或父母在家中只使用母語，並當孩子使用官方語言時，假裝聽不懂並用母語回應。

語言實踐指的則是家庭成員日常使用的語言，這是顯性且具體的行為。Curdt-Hristiansen (2009) 認為，單單擁有語言意識並不足以保存語言，必須要有適當的語言管理措施來支持語言的傳承，才可能逆轉語言流失的命運。

二、語言信念、語言管理及語言實踐之關係

國外有關Spolsky語言政策的研究，多以質性研究探討家長語言信念對語言實踐、語言管理的影響。研究發現，當父母認為他們的孩子對官方語言的習得會受到族語的干擾和阻礙時，他們會調整他們的做法和管理工作，避免他們認為是障礙的語言（Mertz, 1989）。相反地，對族語持積極態度的父母會刻意用族語和孩子交談（Berardi-Wiltshire, 2017）。

有些研究探討家庭語言政策三個面向的關係，例如：De Houwer (1999) 發現公開表明的語言信念與隱蔽、未自覺的信念並不一致，而語言實踐會受到隱蔽信念的影響。Schwartz (2008)、Curdt-Christiansen (2009) 以及Kopeliovich (2010) 研究發現，支持官方語言家長的語言信念和語言實踐、語言管理不太一致，這可能是基於實用上的考量和幼兒的能動性。

在量化研究方面，目前僅有Hollebeke等人 (2022) 以問卷調查比利時776個多語言家庭，結果發現語言信念與實踐、語言實踐與管理密切相關，但語言信念和管理之間並沒有影響關係。綜合國外研究結果，本土語言信念、本土語言管理及本土語言實踐三者關係密切，然語言信念和語言管理之間的關係需要更多實證研究來進一步證實。

三、臺灣家庭本土語言政策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沿用國內語言教育政策中常見的用語「本土語言」，指稱臺灣境內廣泛使用的在地語言，主要包含閩南語、客語及各族原住民語言等，於臺灣本地長期存在並具有文化、族群傳承意義的語言種類。目前臺灣有關家庭本土語言政策的研

究多採質性研究方法，主要以少數家庭為研究對象，透過訪談、觀察等方式蒐集資料，探討家庭語言的保存和流失情況，以及影響家庭語言政策形成的因素。這些研究比較集中在原住民族語言，例如：阿美族（張學謙，2016）、泰雅族（陳淑娟，2007），以及福客通婚家庭（張學謙與賴佳珍，2014）。

研究顯示，家庭在面臨本土語言流失的困境時，常因缺乏語言使用對象與環境，導致本土語言的世代傳承情況不理想（張學謙與賴佳珍，2014；陳淑娟，2007）。儘管家長普遍對本土語言並未有負面的態度，並希望能夠保存本土語言，但他們往往缺乏足夠的語言意識型態來支持具體的語言維護行動和管理規劃，在日常生活中，侷限於生活忙碌及語言使用習慣，大多數父母對子女都以華語為主（張學謙與賴佳珍，2014）。

綜觀國內的相關研究，雖然提供了對家庭語言政策豐富的描述與詮釋，且其結果與國外文獻相符，但這些研究的限制在於未能驗證家庭語言政策三個面向的關係，因此無法進行通則化的推論。目前，臺灣尚未有針對幼兒家長進行的量化研究，探討家長對本土語言的信念與管理如何影響本土語言的實踐，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幼兒家長的本土語言信念與管理，並檢視其是否能預測本土語言的實踐情況，以便對臺灣幼兒家庭的本土語言政策提出實務建議。

此外，Curdt-Christiansen (2009) 指出，家庭語言政策會受到家長教育程度、語言經驗、對雙語知識的理解等微觀因素，以及政策、社會文化、經濟等鉅觀因素的影響。基於此，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家長及幼兒園的背景因素是否對其本土語言政策有所影響。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桃園市幼兒園家長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根據全國幼教資訊網所公告桃園市公、私立幼兒園共計641間，作為本研究抽樣的母群體。抽樣採分層叢集方法，依桃園市13個行政區幼兒園數量占全市總園數的比率，先隨機抽取30間幼兒園。再從每間幼兒園中，隨機抽取30%的幼兒家長參與調查。研究者於2024年5月至6月期間寄發正式問卷，共發出841份問卷。剔除未回收、填答不全的問卷後，共計回收有效問卷為700份，有效樣本數達83.5%。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編製「幼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問卷」，以作為蒐集資料的研究工具。問卷編擬首先由研究者依據相關文獻探討（Hollebeke et al., 2022），並諮詢三位幼兒教育與本土語言領域之專家學者後設計好預試問卷。隨後以桃園市三間幼兒園共100位家長進行預試，回收之預試問卷經項目分析刪除或修改鑑別度較差之題項。

問卷內容包含「基本資料」及「幼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兩大部分。基本資料包括家長個人背景變項及幼兒園背景變項。家長個人背景包括家長出生年、學歷、職業、父母族群、家庭型態、會的本土語言（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不會本土語言）、子女年齡等七項；幼兒園背景變項則包括幼兒園是否參與本土語言相關計畫（融入式、沉浸式教學、生活學校）。「幼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之原始題目為26題，經預試之分析檢測，調整為18題的正式問卷。問卷內容涵蓋「本土語言信念」、「本土語言實踐」及「本土語言管理」等三個構面。題目選項為Likert五點量表，從「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到「非常不同意」。有關問卷之構面分述如下：

(一) 「本土語言信念」構面：測量家長對幼兒學習本土語言的看法，正式問卷題目涵蓋「我認為本土語言有傳承的必要」、「我認為本土語言是有價值的」、「我認為幼兒會本土語言可以增進與家庭成員的聯繫」、「我認為幼兒會本土語言有助於族群文化的保存等面向」等，共計八題。

(二) 「本土語言管理」構面：測量家長在家對本土語言的干預和規劃。正式問卷題目涵蓋：「家人們對於在家使用本土語言有明確的約定」、「我會要求孩子在家說本土語言」、「我會提醒家人跟孩子說本土語言」、「當孩子跟我說華語時，我會用本土語言回他」，共計四題。

(三) 「本土語言實踐」構面：測量家長在家使用本土語言的情形，正式問卷題目涵蓋「我在家會用本土語言和孩子交談」、「家中長輩會用本土語言和孩子交談」、「我會給孩子聽本土語言的故事歌謠」、「我會給孩子看本土語言的影片節目」等，共計六題。

三、問卷信度與效度

研究者利用因素分析考驗問卷的建構效度，首先以KMO值和Bartlett球形檢定來判別量表是否適合做因素分析。本量表之KMO值為.906，Bartlett球形檢定達顯

著 ($p < .001$)，顯示取樣適合，相關矩陣亦符合統計預設，故進行探索性行因素分析。將項目分析後所保留之題目進行因素分析，採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素，並以最大變異法進行轉軸，分析結果如表1。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達.70以上，其解釋總變異量為70.41%。

表 1
「幼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問卷」之因素分析

題目	因素名稱		
	本土語言信念	本土語言實踐	本土語言管理
d1	.85		
d2	.85		
d3	.80		
d4	.79		
d5	.82		
d6	.83		
d7	.81		
d8	.83		
d13		.74	
d14		.75	
d15		.70	
d16		.75	
d17		.71	
d18		.74	
d9			.80
d10			.89
d11			.86
d12			.84
解釋變異量 (%)	31.11	20.340	18.96
解釋總變異量 (%)		70.41	
KMO值		.906	

註：負荷量小於.40刪除。

由於本研究擬驗證Spolsky家庭語言政策理論，需對「幼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問卷」進行測量模式的評估。本研究回收正式問卷後，採用偏最小平方法檢測，問卷三個潛在構面之Cronbach's α 係數介於.878至.939，Rho_A介於.889至.948，顯示問卷具有良好信度與內部一致性。而組合信度介於.908至.949，平均變異萃取量（AVE）介於.622至.807，顯示問卷具有收斂效度，分析結果如表2。

表 2

潛在構面的Cronbach's α 信度、Rho_A、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萃取量摘要

潛在構面	Cronbach's α 信度	Rho_A	組合信度	平均變異萃取量
語言信念	.939	.948	.949	.698
語言實踐	.878	.889	.908	.622
語言管理	.920	.924	.943	.807

在區別效度上，三個潛在構面的相關係數介於.203至.614，各潛在構面的平均變異萃取量之平方根介於.789至.898。三個構面的相關係數皆低於相鄰潛在構面的平均變異萃取量平方根，代表問卷三個構面應為不同的構面，具有區別效度，分析結果如表3。

表 3

潛在構面的區別效度摘要：Fornell-Larcker檢定

潛在構面	語言信念	語言實踐	語言管理
語言信念	.835		
語言實踐	.357	.789	
語言管理	.203	.614	.898

註：矩陣對角線為平均變異萃取量的平方根，非對角線數值為相關係數。

表4顯示「家長本土語言政策問卷」不同潛在構面的HTMT值介於.206至.672，皆小於.85的建議標準（Henseler et al., 2015）。依此統計結果表示「家長本土語言政策問卷」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根據上述各測量模型的數值，問卷三個構面之間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

表 4

潛在構面的區別效度摘要：HTMT矩陣

潛在構面	語言信念	語言實踐	語言管理
語言信念			
語言實踐	.392		
語言管理	.206	.672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依研究問題，以SPSS及SmartPLS軟體進行的統計方法如下：

(一) 以平均數分析表示幼兒家長本土語言信念、本土語言管理及本土語言實踐之現況。

(二)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幼兒家長背景變項中之出生年、學歷、職業、族群、家庭型態、會的本土語言、子女年齡等，以及幼兒園班級是否參與本土語言相關計畫之幼兒園背景變項在本土語言信念、本土語言管理及本土語言實踐是否有顯著差異。若達顯著差異，則以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

(三) 以集群分析將幼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予以分類，並以獨立性卡方考驗進行各集群類型人口變項之檢定。

(四) 以偏最小平方法驗證本土語言信念、本土語言管理及本土語言實踐三者之間的關係。

肆、研究結果

一、幼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現況

表5呈現「幼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問卷」三個層面之平均數與標準差，以「本土語言信念」層面平均得分4.12最高，顯示家長對本土語言的看法普遍是正向的。其次，「本土語言實踐」層面之得分2.88，表示家長在家裡使用本土語言的行為不高；幼兒家長在「本土語言管理」層面平均得分2.41為最低，呈現家長在維持本土語言所做的干預和規劃偏低。

表 5

「幼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問卷」各層面之描述統計

層面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本土語言信念	8	4.12	0.65
本土語言管理	4	2.41	0.84
本土語言實踐	6	2.88	0.82

進一步比較問卷每一個題目的平均得分，最高分的三題（如表6）都是本土語言信念面向，幼兒家長肯定本土語言傳承的必要、認為本土語言是有價值的且有助於族群文化的保存。

表 6

高分的題項

題目	平均數
2. 我認為本土語言有傳承的必要	4.334
1. 我認為本土語言是有價值的	4.281
6. 我認為幼兒會本土語言有助於族群文化的保存	4.217

而最低分的三題（如表7），皆是本土語言管理面向，包含家長不會用本土語言回應幼兒、不太會要求孩子在家說本土語言、也不太會提醒家人要跟孩子說，顯示家長在家裡缺乏保存本土語言的積極作為，家庭內部自發性傳承本土語言的功能衰退。本土語言使用場域的縮減是臺灣本土語言復振研究中一直存在的議題（蕭素英，2007），有鑑於家庭是奠定幼兒本土語言能力及強化本土語永續生存的核心場域，如何在家庭延續本土語言，使本土語言免於滅絕，是要正視的議題。

表 7

低分的題項

題目	平均數
12. 當孩子跟我說華語，我會用本土語言回他	2.244
10. 我會要求孩子在家說本土語言	2.363
11. 我會提醒家人跟孩子說本土語言	2.437

二、背景變項在本土語言信念、管理與實踐之差異性分析

幼兒家長是否因個人背景、幼兒園背景的不同，在本土語言信念、管理、實踐上有所差異？本研究逐一將樣本依家長出生年、學歷、職業、族群、家庭型態、會的本土語言、子女年齡，以及幼兒園班級是否參與本土語言相關計畫等不同背景變項進行分組，並以ANOVA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背景變項組別的家長，在本土語言信念、管理、實踐之差異顯著性。

就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出生年、學歷、職業、族群、子女年齡及幼兒園班級是否參與計畫的家長在本土語言政策之平均數的差異未達顯著水準($p > .01$)，即幼兒家長不因其年齡、學歷、職業、族群、子女年齡及幼兒園參與計畫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本土語言政策。

會不同本土語言家長在本土語言政策上有顯著差異，進一步以Scheffé法進行多重比較，結果如表8所示。會不同本土語言之家長在「本土語言信念」($F = 5.14, p < .001$)、「本土語言管理」($F = 11.92, p < .001$)及「本土語言實踐」($F = 27.41, p < .001$)有顯著差異。會客語、會原住民語者在本土語言信念、本土語言管理及本土語言實踐上顯著高於不會本土語言者。會閩南語者在本土語言實踐上顯著高於不會本土語言者。會客語者在本土語言管理上顯著高於會閩南語者。家長本身不會本土語言，當然就無法傳承。會客語的家長在本土語言管理上較積極，或許和本研究調查的有些幼兒園班級有參與客語相關計畫有關，導致會客語的家長更重視幼兒學習客語的引導和干預。

不同家庭型態的家長在本土語言政策上亦存有顯著差異，透過Scheffé法多重比較（如表9），進一步分析後發現，在「本土語言管理」($F = 3.40, p < .01$)和「本土語言實踐」($F = 5.34, p < .001$)兩個面向中，其他家庭型態（如單親、隔代教養家庭）在本土語言管理和本土語言實踐上顯著高於小家庭。此結果支持家庭型態會影響家庭語言使用模式的論點。研究指出，祖父母常為語言傳承的重要來源，在隔代教養家庭中，祖父母不僅參與幼兒的日常照顧，也透過與幼兒的互動，使本土語言得以持續在家庭中流通（Curdt-Christiansen, 2013; Yamamoto, 2001）。同時，單親家庭由於僅有一位家長主要使用特定語言，相較於多元語言並存的家庭型態，較不易出現語言排擠的現象，反而有助於本土語言在家庭中的保留與傳承（De Houwer, 2009）。

表 8

會不同本土語言家長在本土語言政策之差異

向度	會的本土語言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本土語言 信念	客語	229	4.17	.62	5.14***	(1) > (4)
	閩南語	351	4.12	.64		(3) > (4)
	原住民語	26	4.45	.64		
	不會本土語	94	3.94	.69		
本土語言 管理	客語	229	2.64	.86	11.92***	(1) > (2)
	閩南語	351	2.33	.79		(1) > (4)
	原住民語	26	2.55	.92		
	不會本土語	94	2.09	.81		
本土語言 實踐	客語	229	3.03	.75	27.41***	(1) > (4)
	閩南語	351	2.95	.78		(2) > (4)
	原住民語	26	2.97	.79		(3) > (4)
	不會本土語	94	2.20	.87		

*** $p < .001$.

表 9

不同家庭型態家長在本土語言政策之差異

向度	家庭型態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本土語言 信念	小家庭	308	4.12	.61	1.56	
	三代及大家庭	365	4.11	.67		
	其他	27	4.36	.65		
本土語言 管理	小家庭	308	2.35	.75	3.40**	(3) > (1)
	三代及大家庭	365	2.43	.90		
	其他	27	2.76	.95		
本土語言 實踐	小家庭	308	2.89	.77	5.34***	(3) > (1)
	三代及大家庭	365	2.83	.84		(3) > (2)
	其他	27	3.36	1.07		

** $p < .01$. *** $p < .001$.

三、幼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的類型分析

本研究透過集群分析，瞭解幼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存有哪些類型。研究採用兩階段集群分法。第一階段利用Ward法進行階層式集群分析以決定集群個數，顧及階層式集群分析之樣本不宜太大，故隨機抽取總樣本中的50個樣本作為代表進行分析。第二階段係利用K-means法進行分析，以上一階段所得之集群個數作為分析，重新將總樣本予以分析以得到最終之分群結果。分析結果將幼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類型區分為三，且為驗證集群個數之有效性，以變異數分析檢定三集群在本土語言信念、本土語言管理及本土語言實踐的差異情形，並以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如表10所示。各集群在本土語言信念、管理及實踐上的差異，皆達.001之顯著水準，代表本研究之分群符合組間異質、組內均質之特性。

表 10
幼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之分群差異性檢定結果

	集群1 (N = 197)	集群2 (N = 337)	集群3 (N = 166)	F值	事後比較
本土語言 信念	3.72	4.13	4.59	105.572***	2 > 1 3 > 1 3 > 2
本土語言 管理	1.63	2.37	3.41	479.247***	2 > 1 3 > 1 3 > 2
本土語言 實踐	1.98	2.94	3.82	631.552***	2 > 1 3 > 1 3 > 2

*** $p < .001$.

集群1的家長(N = 197)占研究對象的28%，在本土語言信念、本土語言管理及本土語言實踐等面向的得分明顯低於其他集群，且低於總平均分數。集群1對本土語言信念介於「普通」和「同意」之間，但在本土語言管理和本土語言實踐上顯得負向消極，為「弱本土語言政策型」。集群2的家長(N = 337)占研究對象的48%，本土語言信念是正向肯定的，但在本土語言管理和本土語言實踐上介於「不同意」和「普通」之間，為「中本土語言政策型」。集群3的家長(N = 166)占研究對象的24%，對本土語言信念為積極正向，在本土語言管理和本土語言實踐上介於「普通」和「同意」之間。三個面向的平均分數高於全體研究對象之總平均分數，為「強本土語言政策型」。

本研究為進一步瞭解三個本土語言政策類型家長的人口特徵是否有差異存在，以獨立性卡方考驗進行各集群人口變項之檢定。結果如表11所示。依檢定結果可知，此三個集群類型在家長出生年、會的本土語言、家庭型態等特徵變項上的百分比例存有顯著差異，集群1、2、3的人口特徵為家長出生年以「1986-1994年」比例最高，會的本土語言以「閩南語」的比例最高。集群1和集群3的家庭型態以「三代及大家庭」的比例最高，集群2的家庭型態以「小家庭」的比例最高。因本研究對象原有人口結構之家長出生年以「1986-1994年」比例偏高，且受會「閩南語」、「三代及大家庭」型態居多等既成條件的影響，使得三個集群人口比例與原有人口結構一樣。

表 11
 幼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類型之人口背景差異比較

向度	人口背景	集群1 (N=197)	集群2 (N=337)	集群3 (N=166)	總合	卡方考驗
出生年	1975年以前	6 (15.8%)	21 (55.3%)	11 (28.9%)	38 (100.0%)	18.008**
	1976-1985年	60 (23.3%)	134 (52.1%)	63 (24.5%)	257 (100.0%)	
	1986-1994年	107 (30.3%)	168 (47.6%)	78 (22.1%)	353 (100.0%)	
	1994年以後	24 (46.2%)	14 (26.9%)	14 (26.9%)	52 (100.0%)	
會的本土語言	客語	43 (18.8%)	114 (49.8%)	72 (31.4%)	229 (100.0%)	45.987***
	閩南語	98 (27.9%)	173 (49.3%)	80 (22.8%)	351 (100.0%)	
	原住民語	7 (26.9%)	11 (42.3%)	8 (30.8%)	26 (100.0%)	
	不會本土語	49 (52.1%)	39 (41.5%)	6 (6.4%)	94 (100.0%)	
家庭型態	小家庭	77 (25.0%)	171 (55.5%)	60 (19.5%)	308 (100.0%)	33.374***
	三代及大家庭	114 (31.2%)	162 (44.4%)	89 (24.4%)	365 (100.0%)	
	其他	6 (22.2%)	4 (14.8%)	17 (63.0%)	27 (100.0%)	

p < .01. *p < .001.

在家長會的本土語言這個人口特徵上，集群1有75.1%的家長（148位）會本土語言，但他們在家幾乎不使用本土語言交流，家庭缺乏本土語言使用的環境，本土語言的世代傳承面臨消逝的危機。

除此之外，研究顯示不同家長出生年、會的本土語言及家庭型態在家庭本土語言政策的比例是不同的。根據表11，出生於「1975年以前」、「1976-1985年」「1986-1994年」的家長屬「中本土語言政策型」的比例最高（分別為55.3%、52.1%、47.6%），但出生於「1994年以後」的家長為「弱本土語言政策型」的比例最高（46.2%）。愈年輕世代的家長為「弱本土語言政策」的比例有增加的現象。出生於1986-1994年這一代的家長是國家教育政策開始注重本土的語言文化、開始接觸「鄉土語言」課程的世代（葉高華，2017）。出生於1994年以後的家長則接觸到英語學習向下延伸至國小，英語列入小學高年級正式課程（張武昌，2014）。學校的語言教育固然提供孩童學習和使用語言的機會，然解決本土語教育面臨的問題是需要家庭和社區的多方合作，社區和家庭也應提供豐富的語言環境和學習機會，才能真正提升本土語的重要性。

四、幼兒家長本土語言信念、本土語言管理及本土語言實踐之關係

本研究依據Spolsky語言政策理論與相關研究，假定幼兒家長本土語言信念會影響本土語言管理、本土語言實踐，以及本土語言管理會影響本土語言實踐。

本研究採用偏最小平方法檢測結構模式。表12指出「家長本土語言政策問卷」結構模式之效度檢定結果，不同構面的 R^2 值介於.041至.433，調整後 R^2 值介於.040至.431。研究者使用盲解法（blindfolding）估計內生變數的預測相關性，不同構面的預測相關性 Q^2 介於.032至.263，皆高於0的檢定標準，意指結構模式對內生變數具有預測相關性。結構模式的整體模型SRMR指標為.068，低於.8的檢定標準，顯示「家長本土語言政策問卷」假設模型具有合理結構模式品質和解釋力，整體適配度良好。

圖1指出路徑係數及相關統計量，本土語言信念對本土語言管理有直接正向影響（直接效果.203）。本土語言管理對本土語言實踐有直接的正向影響（直接效果.564）。本土語言信念對本土語言實踐有直接的正向影響（直接效果.243），亦會透過本土語言管理造成間接的正向影響（間接效果.116）（如表13）。以模型解釋力而言，本土語言管理被解釋變異量為4.1%，而本土語言實踐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表 12
潛在構面的效度檢定摘要

潛在構面	R^2	Adj. R^2	φ^2	SRMR
語言信念				.068
語言實踐	.433	.431	.263	
語言管理	.041	.040	.032	

圖 1
幼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之理論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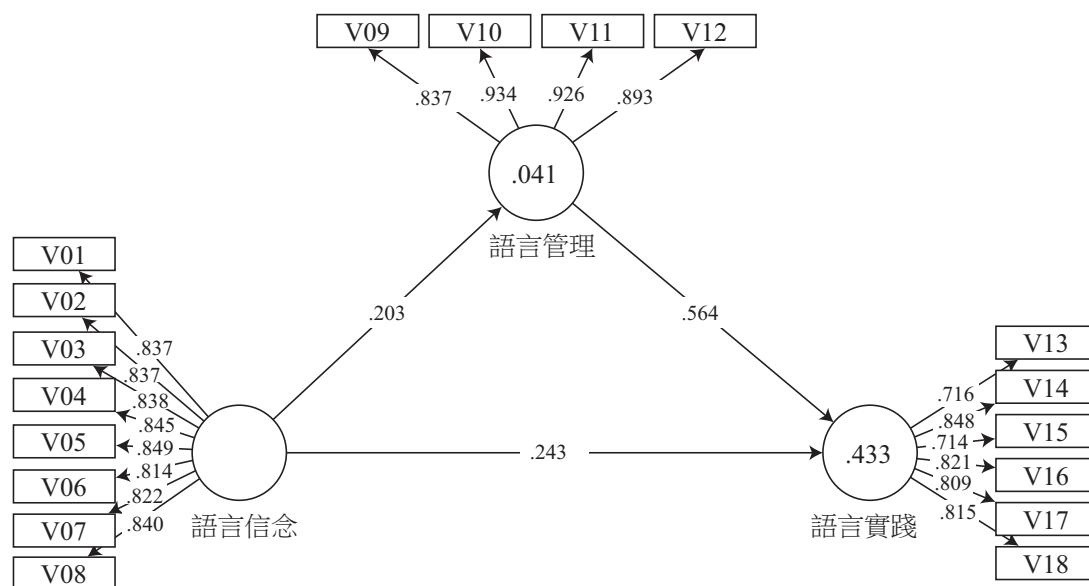


表 13
研究假設的路徑係數與整體效果之統計檢定摘要

路徑	直接 效果	間接 效果	整體 效果	t值	Bias-Corrected 95%信賴區間 [下界、上界]
假設1：語言信念→語言實踐	.243	.116	.357	1.083	[.288, .429]
假設2：語言信念→語言管理	.203		.203	5.744	[.133, .272]
假設3：語言管理→語言實踐	.564		.564	2.826	[.510, .616]

43.3%。

綜上所述，研究結果支持本土語言信念、管理和實踐相互影響的假設，相信本土語言價值的家長傾向於促進本土語言使用，且對本土語言的管理影響語言的使用。但是，以模型解釋力而言，本土語言信念僅能解釋本土語言管理4.1%的變異性，解釋力偏低。此研究結果與國外研究相似，顯示本土語言信念與本土語言管理的關聯性比理論假設來得微弱 (Hollebeke et al., 2022; Van Oss et al., 2022)。

針對語言信念對語言管理影響性不高的狀況，可以從Hollebeke等人(2022)的看法來解釋可能的三個原因：

一是語言信念是一種理想，而理想會受到現實條件的限制，例如：即使家裡沒有提供學習和使用本土語言的空間，父母仍相信本土語言的價值和重要性。

二是本土語言管理容易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有研究顯示父母會因為孩童的抗拒和家庭成員的衝突，而重新考慮語言策略，儘管他的語言信念沒有改變 (Kopeliovich, 2010)。

三是即使幼兒和家庭外在環境的影響有限，但家庭還是經常對語言做出妥協，例如：家長會受限於習慣是用官方語言，所以不在家庭中使用本土語言。

伍、研究結論及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 幼兒家長本土語言信念、管理及實踐的現況

研究結果顯示，家長對本土語言的看法普遍為肯定、正向，多數家長認為本土語言傳承是必要且有價值的，亦有助於族群文化的保存。然而，家長在家實際使用本土語言的行為表現並不高，維持本土語言的具體努力也相對不足，家長較少以本土語言回應幼兒，亦較少要求幼兒或提醒家人在家中使用本土語言，顯示實務上的本土語言使用與價值認同間存在落差。

(二) 背景變項對本土語言信念、管理及實踐之差異性分析

進一步比較不同背景特徵的家長後發現，具備不同本土語言能力之家長以及不同家庭型態之家長，在本土語言信念、管理及實踐上存在顯著差異。會說客語、原住民語的家長在本土語言信念、管理及實踐層面之表現顯著高於不會本土語言的家長；而會說閩南語者在本土語實踐方面則顯著高於不具本土語言能力的家長。

(三) 幼兒家長本土語言政策的類型分析

本研究將幼兒家長分為三個集群類型：「弱本土語言政策型」、「中本土語言政策型」與「強本土語言政策型」。其中，「弱本土語言政策型」（集群1）雖然對本土語言信念持肯定態度，卻在本土語言管理和本土語言實踐上相當消極。「中本土語言政策型」（集群2）對本土語言信念持正向肯定態度，但在本土語言管理和實踐層面仍較低。「強本土語言政策型」（集群3）對本土語言信念持高度積極正向態度，在本土語言管理與實踐層面則介於普通和符合之間。

三個集群在人口背景特徵比例上與樣本人口結構相近，但年齡較輕（出生於83年之後）的家長傾向於「弱本土語言政策型」的比例較高，顯示年輕世代對本土語言雖有認同，但在實際應用中並未有足夠行動支持。此外，集群1中有75%的家長具本土語言能力，卻極少使用本土語與幼兒互動，家庭缺乏使用本土語言的環境。

(四) 本土語言信念、本土語言管理及本土語言實踐之關係

由研究模式的路徑分析可知，本土語言信念對本土語言管理、本土語言管理對本土語言實踐，以及本土語言信念對本土語言實踐，有直接影響效果。本研究模型中，本土語言管理被解釋變異量為4.1%，而本土語言實踐被解釋的變異量則高達43.3%，顯示本土語言信念對語言管理的影響性不高。

二、研究建議

本研究發現，強健的家庭本土語言政策有助於延緩或扭轉語言流失，當家庭將本土語言視為日常溝通媒介並積極支持其使用，則本土語言在家庭場域的活力愈發顯著。依據研究結果，以下針對幼兒家庭之本土語言政策提出建議：

(一) 提升家長對本土語言的正向信念

人們對於語言本身和語言使用抱持的情感、信仰，往往受個人喜好、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因素的交互影響，即家庭的語言政策會受大環境的牽制。如果國家能營造尊重本土語言的社會氛圍，並提供能實質運用本土語言的就業機會和生活情境，使本土語言具備實用價值和經濟利益，家長將更願意積極肯定本土語言的傳承與使用。

(二) 意識到本土語言管理的必要性

家長的語言信念不見得會促成對本土語言的干預和規劃，然語言管理對語言實踐有實質的影響。許多家長在自由放任的家庭語言政策下，常未意識到本土語的選項，會有忘卻本土語言的現象。家庭宜透過干預方式來改變或影響幼兒本土語言的使用，例如：以鼓勵或堅持的方式希望幼兒在家裡開口使用本土語言，倘若家庭採用消極或自由放任的語言管理，不積極要求孩童使用本土語言，則容易導致本土語言在家裡的流失。因此，應該喚起家庭對於本土語言管理的意識，瞭解到本土語言的傳承需要家庭積極的規劃與管理，才可能逆轉語言流失的命運。

(三) 增進本土語言管理的做法

家庭是本土語言保存的重要堡壘，藉由家長積極介入家庭本土語言規劃，不但可以確立家庭的主體性，更可以建立家庭母語的世代傳承，有效地達成母語復振。政府單位及幼兒園可以透過某些做法，協助家庭建立本土語言管理機制，養成在家使用本土語言的習慣。例如：幼兒園可以設計本土語言的親子學習單或活動給幼兒帶回家，請家長配合鼓勵幼兒運用本土語言於日常生活中，提供本土語言在家庭裡的學習和使用空間。或是透過親職講座讓家長意識到本土語言保存的問題，鼓勵父母規劃語言管理的具體作為，例如：父母親各自以本身的本土語言和孩子說話，要求孩子以本土語言回答父母親。抑或借助祖父母之力，培養小孩的本土語言能力，在特定節日或是與小孩互動遊戲時，教導幼兒一些族群節慶用語，或是唱本土語言童謡，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將本土語言融入日常活動和互動。

參考文獻

- 張武昌（2014）。臺灣英語教育的「變」與「不變」：面對挑戰，提升英語力。中等教育，65（3），6-16。<https://doi.org/10.6249/SE.2014.65.3.01>
- 【Zhang, W.-C. (2014). Changing and unchanging in English education in Taiwan: Facing challenges and enhancing English proficiency. *Secondary Education*, 65(3), 6-16. [https://doi.org/10.6249/SE.2014.65.3.01】](https://doi.org/10.6249/SE.2014.65.3.01)
- 張學謙（2016）。再造家庭族語傳承：阿美族家庭的個案研究。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9（3），1-47。[https://doi.org/10.29910/TJIS.201611_9\(3\).0001](https://doi.org/10.29910/TJIS.201611_9(3).0001)
- 【Zhang, X.-Q. (2016). Reclaiming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ndigenous language within the home: A case study of an Amis family. *Taiwan Journal of Indigenous Studies*, 9(3), 1-47. [https://doi.org/10.29910/TJIS.201611_9\(3\).0001】](https://doi.org/10.29910/TJIS.201611_9(3).0001)
- 張學謙與賴佳珍（2014）。台東福佬客家通婚與語言保存：家庭語言政策的個案分析。客家研究，7（2），1-38。
- 【Zhang, X.-Q., & Lai, J.-Z. (2014). Language maintenance in Holo and Hakka mixed families in Taitung: A multiple case study of family language policy. *Hakka Global Studies*, 7(2), 1-38.】
- 陳淑娟（2007）。台灣語言能力及語言使用的個案研究：以閩、客雙語的大牛欄及泰雅族水田部落為例。載於鄭錦全（主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頁51-68）。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Chen, S.-J. (2007).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language use in Taiwan-Southern Min & Hakka language in Da-Niu-Lan settlement and Shuitian tribe. In J.-Q. Zheng (Ed.), *Multicultural thinking on language policy* (pp. 51-68).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黃建銘（2011）。本土語言政策發展與復振的網絡分析。公共行政學報，39，71-104。[https://doi.org/10.30409/JPA.201106_\(39\).0003](https://doi.org/10.30409/JPA.201106_(39).0003)
- 【Huang, J.-M. (2011). Network analysis on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of native language policy.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9, 71-104. [https://doi.org/10.30409/JPA.201106_\(39\).0003】](https://doi.org/10.30409/JPA.201106_(39).0003)
- 葉高華（2017）。臺灣民眾的家庭語言選擇。臺灣社會學刊，62，59-111。[https://doi.org/10.6786/TJS.201712_\(62\).0002](https://doi.org/10.6786/TJS.201712_(62).0002)

【Ye, G.-H. (2017). Family language choice in Taiwan.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62, 59-111. [https://doi.org/10.6786/TJS.201712_\(62\).0002](https://doi.org/10.6786/TJS.201712_(62).0002)】

蕭素英（2007）。*Holo話與客家話的活力：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語言活力與瀕危度的評估準則談起*。載於鄭錦全（主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頁69-88）。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Hsiao, S.-Y. (2007). The vitality of Holo and Hakka: A discussion based on UNESCO's criteria for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In J.-Q. Zheng (Ed.), *Multicultural thinking on language policy* (pp. 69-88).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Arnaus Gil, L. (2002). Spanish and German as heritage and majority languages in early multilingual acquisition: Family language policies and other child-external factors for heritage language compet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19(2), 1-23. <http://doi.org/10.1080/14790718.2022.2040511>

Berardi-Wiltshire, A. (2017). Parental ideologies and family language policies among Spanish-speaking migrants to New Zealand. *Journal of Iberian and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23(3), 271-285. <https://doi.org/10.1080/13260219.2017.1430489>

Cho, G. (2000). The role of heritage langu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Reflections from a language minority group. *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 24(4), 369-384. <https://doi.org/10.1080/15235882.2000.10162773>

Curdt-Christiansen, X. L. (2009). Invisible and visible language planning: Ideological factors in th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of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Quebec. *Language Policy*, 8, 351-375. <https://doi.org/10.1007/s10993-009-9146-7>

Curdt-Christiansen, X. L. (2013). Family language policy: Sociopolitical reality versus linguistic continuity. *Language Policy*, 12(1), 1-6. <https://doi.org/10.1007/s10993-012-9269-0>

Curdt-Christiansen, X. L. (2016). Conflicting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contradictory language practices in Singaporean multilingual familie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7(7), 694-709. <https://doi.org/10.1080/01434632.2015.1127926>

De Houwer, A. (1999).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early bilingu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parental beliefs and attitudes. In G. Extra & L. Verhoeven (Eds.), *Bilingualism and Migration* (pp. 75-95). Mouton de Gruyter. <http://doi.org/10.1515/9783110807820.75>

De Houwer, A. (2009). *Bilingual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Multilingual Matters. <https://doi.org/10.1080/02671930902910111>

[org/10.21832/9781847691507](https://doi.org/10.21832/9781847691507)

- Henseler, J., Ringle, C. M., & Sarstedt, M. (2015). A new criterion for assessing discriminant validity in variance-ba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43(1), 115-135. <https://doi.org/10.1007/s11747-014-0403-8>
- Hollebeke, I., Van Oss, V., Struys, E., Van Avermaet, P., & Agirdag, O. (2022).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Spolsky's framework applied to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5, 3228-3241. <https://doi.org/10.1080/13670050.2022.2039894>
- Hult, F., & Johnson, D. (2015).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 practical guide*. John Wiley & Sons. <http://doi.org/10.1515/ijsl-2016-0053>
- Huss, L. (1999).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in the far north, linguistic revitalization in Scandinavia and Finland*. Acta Universitatis Upsaliensis.
- King, K., & Fogle, L. (2013). Family language policy and bilingual parenting. *Language Teaching*, 46(2), 172-194. <http://doi.org/10.1017/S0261444812000493>
- King, K., Fogle, L., & Logan-Terry, A. (2008). Family language policy.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Compass*, 2(5), 907-922. <https://doi.org/10.1111/j.1749-818X.2008.00076.x>
- Kopeliovich, S. (2010). Family language policy: A case study of a Russian-Hebrew bilingual family: Towar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Diaspora, Indigenous, and Minority Education*, 4(3), 162-178. <https://doi.org/10.1080/15595692.2010.490731>
- Lanza, E. (2007). Multilingualism and the family. In P. Auer & L. W. Berlin (Eds.), *Handbook of multilingualism and multilingual communication* (pp. 45-68). De Gruyter Mouton.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198553.1.45>
- Lin, C. H., & Warschauer, M. (2011). Integrative versus instrumental orientation among online language learners. *Linguagens e Diálogos*, 2(1), 58-86.
- Luykx, A. (2003). Weaving languages together: Family language policy and gender socialization in bilingual Aymara households. In R. Bayley & S. Schechter (Eds.), *Language socialization in b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societies* (pp. 25-43). Multilingual Matters. <https://doi.org/10.21832/9781853596377-005>
- Mertz, E. (1989). Sociolinguistic creativity: Cape Breton Gaelic's linguistic "tip". In N. C. Dorian (Ed.), *Investigating obsolescence* (pp. 103-11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e, K., Armon-Lotem, S., & Altman, C. (2023). Family language policy and vocabulary of

- bilingual children across different ages. *Ampersand*, 11, 100-154. <http://doi.org/10.1016/j.amper.2023.100154>
- Schechter, S. R., Sharnen-Taboada, D., & Bayley, R. (1996). Bilingual by choice: Latino parents' rationales and strategies for raising children with two languages. *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 20(2), 261-281. <https://doi.org/10.1080/15235882.1996.10668630>
- Schiffman, H. F. (1996). *Linguistic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021569>
- Schwartz, M. (2008).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language policy and heritage language knowledge among second generation Russian-Jewish immigrants in Israe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9(5), 400-418. <https://doi.org/10.1080/01434630802147916>
- Shohamy, E. (2006). *Language policy: Hidden agendas and new approaches*. Routledge. <http://doi.org/10.4324/9780203387962>
- Spolsky, B. (2004).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15245>
- Spolsky, B. (2009). *Language manage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26470>
- Van Oss, V., Van Avermaet, P., Struys, E., & Vantieghem, W. (2022). An empirical validation study of Spolsky's language policy model.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3(1), 77-95. <https://doi.org/10.1080/14664208.2021.1907060>
- Yamamoto, M. (2001). *Language use in families with a Japa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ld: A survey*. Multilingual Matters.
- Zhang, D., & Slaughter-Defoe, D. T. (2009). Language attitudes and heritage language maintenance among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the USA.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22(2), 77-93. <https://doi.org/10.1080/07908310902935940>

2024年10月24日收件

2024年12月03日修改

2024年12月27日接受

A Survey of Native Language Policy of Parents of Preschool Children

Meng-Chin Hsu^{*}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e of native language use in families of young children and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arents' beliefs about native languages, their management of native language use, and their practices in the home. The researcher developed the "Parental Native Language Policy Questionnaire" and surveyed parents of children attending preschools in Taoyuan City, collecting a total of 700 valid response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variance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and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statistical methods. The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Parents generally hold positive views toward native languages. However, actual use of native languages in the family and actions to maintain a native language environment are insufficient. 2. Pare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native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family structure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beliefs, management,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native language use. 3. Based on the status of their beliefs, management, and practices, parents wer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clusters: "Weak Native Language Policy," "Moderate Native Language Policy," and "Strong Native Language Polic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younger generations of parents are more likely to fall into the "Weak Native Language Policy" cluster. 4. The path analysis reveals that parents' beliefs about native languages directly influence their management and practices. Additionally, local language management positively affects local language practices. This highlights the critical role of parental beliefs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 Meng-Chin Hs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romoting the use of native languages within families.

Keywords: parents of preschool children, native languag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use, language management